

# 为有牺牲多壮志

——韩道良在梨树

单志

## 三、战斗在周家油坊

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结束后，梨树县、区、政机关和武工队向北战略转移。韩道良在孤家子安排好善后工作，召开群众大会。他告诉广大群众：“撤退是暂时的，不久我们会回来，我们走后，这里的斗争会非常艰苦，希望你们坚持斗争，并注意保全自己！”说完，他把王振荣带到屋里，从炕上拿起一件半截子羊皮袄，对王振荣说：“这件皮袄属于我个人，送给你做个纪念吧！”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队伍沿着区政府门前的大路向西出发了，韩道良走在最后，快到河边了，韩道良勒转马头，向广大群众挥手暂别。

5月23日，梨树县北撤队伍到达二地委所在地——长岭县新集场。经过在长岭五区八地短暂休整后，二地委指示：“不离区，县不离县”，回伸原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共梨树县委召开会议，决定选拔骨干组成4支武工队，分四路回伸梨树县。此次回伸事关重大，梨树县已经被国民党占领，国民党军队、土匪、地主还乡团以及伪警察、特务、清缴队等各种反动势力，都会给武工队造成危险。县委决策，由县委书记沈洋、副县长郝正平、组织部长吴丕恩各带一路，第一路领队正在研究之中，韩道良挺身而出，请求带领一支队伍回伸孤家子一带打游击，他的自荐得到批准。

5月31日，四路武工队同时从长岭新集

场出发。韩道良带领的武工队，骑马向东进入怀德县境内，在怀德县齐家屯，把马交给县大队带回。当他走到周家油坊时，听到老百姓对地主周永章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行反应强烈，不由得义愤填膺。他选定在辽河北岸周家油坊就地开展工作时，待时机成熟渡河南下梨树七区。

韩道良的这个决定，在武工队内部出现分歧。当晚武工队回到齐家屯，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时，有人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梨树，不是怀德，声势搞大容易引起敌人注意。”韩道良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干革命分什么梨树、怀德！我们的斗争对象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共产党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消灭剥削和压迫。”

6月1日，武工队到周家油坊，周家人都跑了。武工队发动群众，打开周永章家的仓库，把粮食、布匹等物资都分给了村里的劳苦群众。夜幕降临以后，沸腾一天的周家油坊安静下来。群众希望武工队住下来，共产党是他们的靠山，群众离不开主心骨。韩道良认为这里不安全，于是，把队伍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在一间没点灯的屋子里，韩道良同几位组长进行了一场声音很低的争论。有人主张武工队应该回避一下，不再去周家油坊。理由：一是武工队与敌人只有一河之隔，周家的人会不会与国民党军有勾结；二是派出去找周永章的人至今未归，可能事情有变。总之，再回去是有危险的。韩道良也坚持自己的理由：正因为武工队分了老周家，才有责任去保护群众，巩固斗争成果。争论很激烈，韩道良来回走动，情绪有点失控，脱口而出：“现在最安全的地方是天上，怕死你们到天上去！”随后又冷静一些说：“我们不

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全，还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国民党来了他们会遭殃的。”

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韩道良又带领武工队来到周家油坊。为了安定群众，让大家过好端午节，他把武工队分成两个组，一组由他和三区长刘汉卿带领，在东头扒掉周永章家的炮台和院墙。另一组由贺天中和苏甫带领，在村西头一家做过节的准备工作。

太阳偏西时，安排生活的一组，在村西头一户农民家里把一切安排就绪后，大家围坐在地上擦拭枪支，突然有一位农民跑进来报信说：“不好了，国民党军来了好几万人，把东头韩政委他们包围了！”这时已听到外边的枪声和爆炸声。苏甫说：“别犹豫，赶快转移村外”。贺天中一挥手：“到村外想办法”。为了不暴露目标，来送信的人前面引路，武工队员从一条干沟底转移到村外，趴在干沟沿上往村东头打一阵枪，目的是把敌人的火力引过来，以便韩道良他们乘机突围。

村子东头的战斗十分激烈。韩道良和刘汉卿的武工队，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他们只有8个人，面对一百多敌人组成的包围，凭借墙头作掩体，顽强地抵抗着。敌人一次次冲上来，他们一次次把敌人打下去，激战中刘汉卿钻进碾坊，以碾盘为掩体，不幸中弹牺牲。武工队的战士几次突围，都被敌人的火力压回来，敌人逼近了墙根，武工队退进屋内，双方火力交叉，武工队英勇地战斗着。从太阳偏西一直坚守到夜幕漆黑，最后终因寡不敌众，韩道良等7人全部被俘，当晚被国民党军带回孤家子。

## 四、壮烈牺牲

国民党71军88师的一个团部，就设在原区政府后面的大庙里。庙棚上悬挂一盏汽灯，庙堂阴森，灯光半明半暗。韩道良被倒缚着双手，在审讯人员面前傲然挺立。他对国民党的一个副团长说：“我是这里的区委书记、县委委员，这支队伍的负责人。我知道的事情他们几个不知道，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好了！”国民党的团副很高兴，当即命令将其他武工队员带下去，只留韩道良一人。

国民党团副假惺惺地说：“你是个爽快人，我们之间不过是两个主义、两种信仰的问题，只要你想得开，我们不难为你。”

韩道良昂首不理。

“你们的县委、县政府和武装队撤退到哪儿了？”

“我们不是撤退，是战略转移。不久我们就会打回来。”韩道良肯定的回答。

“你们共有几支武工队？”国民党团副继续

问。

“对不起，这是秘密。在我们后边还有更多的武工队。”

“你在七区培养了多少红头？”

“每个受压迫剥削的穷苦人，都是我们的红头！”

国民党军的团副和审讯人员，在韩道良义正词严的回答面前无可奈何。经过一番审讯之后，他们也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那个国民党团副气急败坏地拂袖而去。审讯后，韩道良被关在破庙的一个偏殿里，被绑在柱子上，周围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看守着。

6月3日，是个难以忘却的日子。这天是农历五月初四。午后，韩道良被带到西河滩的草甸子上。国民党军以开会为名，挨家挨户强迫老百姓去西河滩围观。老百姓被撵出家门，途中大多溜走，只有20多人隔着小河

站在草甸的西面，国民党兵排队站在小河东面。在国民党兵的前面，有一个不大的土包，韩道良被押在土包上面北挺立。在他的身后，张景永拿着一把铡刀，求报杀父之仇。国民党军官讲话后，张景永迫不及待地举起铡刀，从后边对着韩道良砍下去。韩道良短短二十几岁的生命，在殷红的血泊中结束了。他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崇高的信仰虽死犹荣。他平时常说：“我若是死，也要死的光荣”。他为人民、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他的一生无私无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新中国成立后，梨树人民为纪念韩道良烈士，将他英勇就义的所在地改名为韩道良村。1964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杀害韩道良烈士的刽子手张景永被查明下落，归案正法。1972年，孤家子公社革命委员会为韩道良烈士修建了纪念碑，以志千古。（下）

## 抗战胜利后双辽根据地的建设和作用

王福山

### （二）深入进行土地改革

双辽全境解放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双辽境内彻底结束，封建地主阶级从此失去了政治靠山和武装力量的保护，在根本上为土地改革扫清了障碍。广大翻身农民在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权的领导下，在农会组织的直接参与支持下，按照党中央1946年的“五四指示”和1947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及辽北省委的部署和要求，进行了深入、彻底的土改，本着“耕者有其田”的精神，按照当地土改政策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截止到1948年初，全县14261农户6.5万农村人口，分到土地7.2万垧，占耕地面积的65.5%。房子1.18万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匹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圆1万多元，分浮物1千万余元（东北币），分粮食2.6万石。在清理地主财产时还收缴枪支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截止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飞跃式发展。在为部分开展土改的1947年，全县粮食产量比历史上最好年份增加了10%。194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6.13万吨，比1947年增产133.3%。在土改过程中，县委提拔任用县区机关干部60人，

培养非党积极分子5000人。

在土改期间，工作在双辽的陶铸、郭峰等同志参与领导了双辽土改工作试点，对双辽土改工作专门做过多次批示，专门写过指示信。对工作中存在的急于求成“左”的倾向、斗争精神不强的右的倾向以及基础工作不扎实、土地和浮财分配不公等现象，及时提出了纠正意见，确保了轰轰烈烈的双辽土改工作健康有序进行。并为全省其他地方土改工作的推进提供了有益经验。

### （三）发展经济

双辽县全境解放后，各级人民政府，抓住社会局势基本稳定的大好机遇，拿出很大精力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经济上，实施了各种鼓励措施，焕发了全县人民发展生产、繁荣市场的积极性。

双辽县委、县政府，按照东北局发出《关于1947年财经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积极落实辽北省委、省政府对经济发展要在政策上给予优惠的要求。在支持和鼓励经济发展上实施了优惠政策。如，超过常年产量部分免征公粮；种植棉、麻的耕地免征公粮；1948年发放农贷款1亿元（旧币），农贷粮1000吨；号召和组织部队、机关、学校等非生产单位，无偿帮助农民春耕、夏锄、秋收。县委、县政府成立春耕运动委员会，专门为农民群众解决春耕中缺耕、缺牛、缺农具等具体困难。组织大批干部下乡，引导农民实行“插秧换工和互相代耕”等生产互助

方式，在实行插秧换工中坚持“忙工还忙工，闲工还闲工，人吃马喂合理负担”的原则。提倡在自愿结合、适当搭配的前提下组织互助组。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县委、县政府积极帮助工商业户恢复、发展生产、经营。到1947年下半年，全县皮革、烧锅、车马具等1324家中小型加工企业不仅全部开张，而且收入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如玻璃制品厂、三合铧炉、万新铁工厂、化民铁工厂、洪大铁工厂等开张后很快效益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亚东石印局印刷技术在为当时全国一流，在平齐线铁路和郑大线铁路沿线很有名气；双辽境内多个制酒厂产品深受蒙汉群众欢迎。当时，许多外地工业家来双辽发展工业，如梨树人谢东凡建的亚东石印局，沈阳人贺远山开的万源线烧锅，沈阳人张福在郑家屯开办的聚金长铧炉。面对金融市场极为混乱，币制繁多，多元并存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主动出击的措施，将日伪币逐出流通市场，对其他货币限期回收，成功地开展了反假钞斗争，稳定了本地货币市场。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保障军需民用，繁荣商业贸易，建立了贸易机构，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活跃内外商品交易，组织各种合作社，建立乡村集市，调剂城乡物资。从而活跃了地方贸易交流和商贸经济。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全力控制物价上涨。在全国物价飞涨的形势下，双辽实现了物价基本稳定。（九）

## 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鸦片交易不仅在中国进行，还运往法西斯国家。1941年，为了清偿对德国的700万马克的借款，伪满与法西斯德国签订第三次经济协定时，向德国输出7吨鸦片，每两价格是30元。向日本输出过2吨鸦片，价格也是每两30元。1945年4月，向汪伪政权贩卖10万两，每两价格则是50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日本从事麻药交易的真正目的，不仅是要腐蚀中国人民，并且有比这更阴险的性质”，即“把满洲所栽培的以及朝鲜与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在满洲精制后，再运往世界各地。”

### 七、文化奴役的加深

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目的是要把东北永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为此，伪满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加强控制和榨取，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起对东北人民的专制统治，强制施行奴化教育。

1932年，伪满政权建立之初，就设立了资政局弘报处，专门负责全满思想文化管制工作。不久撤销资政局，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统管伪满的新闻出版广播等舆论宣传工具。1937年又改称弘报处，其职能不断加强，进一步把电影、文学、音乐、戏剧等文化事业控制在手中。以出版界为例，1932年10月出台的《出版法》明确规定：凡是危及伪满洲国存在，“感

乱民心”的书籍，一律禁止出版，对具有民族意识和反满抗日内容的读物严加取缔，对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更是严加查处，一旦发现则统统烧毁。1932年3月到7月，仅5个月的时间，敌伪就焚书650余万册。伪满洲国一出笼，就严令东北各地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禁绝和限制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文化传播。相反，日伪当局则大量输入日本的殖民主义文化，日本的书籍、报刊、电影等充斥了整个东北文化领域，极力宣扬“日满一体”“天皇至上”“王道乐土”等殖民主义毒素。仅1939年1年内，日本发行到东北的报纸就达5494余万份，杂志827余万份，书籍1440余万册。东北人民陷入了文化专制的黑暗深渊。

与此同时，则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妄图使东北人民忘掉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充当日本的顺民。其主要手段有强制人们学日语、篡改历史、移植宗教等。

1937年伪满颁布“新学制”。

关于“新学制”的任务，伪民生部的训令明确指出：“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也就是要中国人俯首帖耳地充当日本殖民者任意驱使的奴才。“新学制”的这种文化奴役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规定日语即“国语”，意在强调日语不是外语，而是“满洲国”的“国语”，使日语教学在整个课程体系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从小学开始就强迫学生学日语，而且日语课时越来越多，到后来竟然超过中国语文课时一倍以上。为了鼓励师生学习日语，日本当局实行了语学津贴制度，每年考核一次，成绩优异者可以升级，日语分为特等和一、二、三等，评为特级的每月发给10元津贴，每等差2元。那些学不好日语的学生则升学、就业都很困难。当时，伪满各机关中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日本人，来往公文、函件也多用日语，中国职员如不懂日语，就很难应付工作，为了保住饭碗，他们也不得不学习日语。（未完待续）

